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的海派文化传承

杨寄荣

(上海海关学院 思政部, 上海 201204)

摘要: 海派文化是多种地域的不同文化融合而成的文化形态, 它构筑了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内容。城市文化建设的核心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海派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高度契合。海派文化的核心价值诸如自由意识和创新精神、规则意识和法治精神、爱国精神和敬业精神等仍然需要传承。对待海派文化要创新发展, 不忘本来; 取长补短, 吸收外来; 以人为本, 面向未来。

关键词: 海派文化; 核心价值; 传承

中图分类号: G 1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9)01-0067-06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19.01.012

Inheritance of Shanghai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ism Core Values

YANG Jiro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partment, Shanghai Customs College, Shanghai 201204, China)

Abstract: Shanghai culture is the most heterogeneous regional culture. It contains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local culture. The core of urban cultural construction is to cultivate and practice socialist core values. Shanghai culture is highly compatible with socialism core values which still need to be inherited, such as freedom consciousness and innovation spirit, rule consciousness and the spirit of rule of law, patriotism and dedication spirit. As for Shanghai culture, we should be innovative stick to its origin, learn from other advanced culture and absorb their merits, be oriented for people as well as future.

Keywords: Shanghai culture; core values; inheritance

一、海派文化及其软实力

城市与人类文明相伴相生,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不同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历史传统孕育了各自独特的城市文化。城市文化滋养着城

市居民, 有着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特点。不同的城市, 因市民口音、生活习惯不同, 市民的精神气质、生活观念、思维方式也各不相同, 致使各城市之间的文化因差异而变得丰富复杂。

海派文化构成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内容, 经过历史的积累沉淀, 其所传导的精神和价值依然熠熠

收稿日期: 2018-07-20

基金项目: 上海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2312439k18); 教育部优秀教学科研团队项目“新时代民族精神的教学研究”(19JDSZK103); 上海市哲社课题“上海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路径研究”(2017XAH001)

作者简介: 杨寄荣(1970-), 女, 教授。**研究方向:** 发展伦理。E-mail: jryang16@126.com

生辉。据传其起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海派”源于中国画。晚清,由于社会流动加剧,大批画家来到上海谋生,上海逐渐成为绘画活动中心。这些画家受到近代社会风气的影响,把民间绘画艺术和西洋画技法融入中国传统画法成为海上画派,故称海派。但其并不为当时主流画派接纳,如《清稗类钞》认为:海者,泛滥无范围之谓。还有一种认为,海派文化起于戏剧的京剧流派,是为别于“京派”而起的称呼,《清稗类钞》称,北京的走红伶人便“呼外省之剧曰海派”。“海派”京剧在传统京剧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也被称为京剧上海流派,但其地位很难与“京派”相匹敌。后来,海派逐渐从中国画、京剧扩展至小说、电影等领域,甚至影响到生活方式、社会风尚,久而久之,形成了海派文化的概念。现在海派文化特指具有上海地方特色的城市文化,即上海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社会风尚等。

海派文化是多种文化融合而成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吸纳了吴越一带和其他地域文化,尤其是近现代西方文化。海派文化包含了三个组成部分,即以现代文明为主体的西方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以江南地域为特点的诗性文化,是西方文化、传统文化和江南文化的结合体。

对于海派文化的特征,近代社会以来的社会达人和学者对此多有论述,如描述为:“具有文化包容性、国际化,涵容性、变革意识、精明文化、万国文化集粹、小市民文化、经商文化、海洋意识及追求时尚等。”^[1]学者熊月之归纳海派文化的特征为:开新、灵活、多样、宽容。学者李伦新归纳海派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具有开放性、创造性、扬弃性和多元性。

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凸显,文化发展战略的研究和实施受到普遍重视。海派文化建设也面临传承和发展的诸多难题,如:如何发扬海派文化的历史传统,实现海派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如何拓展海派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海派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如何既体现现代性又体现民族性?如何在多元文化中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如何在市民中增强文化认同?有学者认为:“海派文化应该站在前沿,成为中国对外文化软实力建设中一支非常重要的队伍。这方面,上海已在文化设施、文化节庆、建筑文化、商业文化、市民文化等建设领域取得佳绩,但

在提高文化认同、推动文化建设主体多元化、集聚名人大师、提升网络文化、鼓励文化创意等方面还有待突破。”^[2]同时,还要摒弃海派文化中的缺点,如“海派文化比较张扬的个性和不够敦厚的心理,是上海在中国的社会评价指数偏低,轻则不受欢迎、不被待见,重则容易受排挤和被孤立的主要原因”^[3]。

此外,社会转型期普遍存在浮躁、急功近利的心态,这对文化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过程中,上海文化的发展也出现过很多问题:或一管就死,或一放就乱,缺乏对于上海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通盘考虑和长规划、短安排;以长官意志左右文化发展的趋势,缺乏从文化发展本身的规律考虑,更缺乏将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现代文化的建设发展作辩证合理的安排;往往在新的文化构想中忽略了对于文化遗迹的保护、对于文化遗产的重视;在向西方引进先进文化过程中,良莠不辨,鱼龙混杂,在追求时尚追慕西方中,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在建设海派文化中忽略本土文化的特性,在对于西方文化的拷贝模仿中,失却了对于海派文化特性的注重与开拓^[4]。

此外,海派文化还面临着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化的理念、思想等文化渗透和价值冲突,文化还要经历大众参与构建与自我认同的过程,这就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保证城市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并从文化自觉的高度对自由主义、多元主义本身进行反思。同时,重新审视海派文化的历史底蕴,继承发扬上海城市精神,促进上海的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进而为全国人民服务。

二、海派文化的核心价值

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城市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部分,城市文化建设是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城市建设的核心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城市文化建设,保证城市文化建设发展的方向。

海派文化正在成为上海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源泉。海派文化从其诞生之日起就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城市精神，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高度的契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由意识和创新精神

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对土地有着强烈的依恋之情和同乡地缘意识，个体观念和自由意识淡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生出现代自由意识。海派文化形成过程中，人口的自由迁徙对上海文化形成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迁徙自由赋予上海生命活力，没有人口流动就没有上海的繁荣发达。按照人口规模，1843年上海在中国城市中排名第十二，排在上海前面的依次是北京、苏州、广州、武汉、杭州、成都、福州、西安、南京、长沙和天津。1875年，上海已是中国第三大城市，仅次于北京和广州。到1900年，上海城市人口超过100万，跃居全国第一。那以后，上海一直是中国人口第一大城市。从1843年到1949年，上海城市人口增加了20多倍，同时期中国总人口增长20%，中国城市化率由5.1%提升到10.64%，城市人口增加一倍。换句话说，近代上海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是全国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的10倍以上。上海超常增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外来移民，占总人口85%左右，外来移民来自外地与外国^[5]。

移民文化使上海人形成了一种自主的人格，具有公共业缘的自治性和民间化色彩，这有些像德国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曾提到的公众领域：“所谓‘公众领域’，首先指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范围，在此范围里能够形成像公众舆论这样的事物。从原则上讲，公众领域的大门向所有公民敞开……在处理共同关心的事务时，公民联合行动，不受制于强权，有了这种保障，他们便可自由聚会、结社、自由发表和公开观点。”^[6]在一个市场自由调控的文化空间内，文化分工以及由此带动的文化产业是通过资本的自由流通建立起来的。历史上，上海最有影响的文化产业，几乎都是由外商或民营资本主导的，很少由政府控制。如上海最大的新闻报纸《申报》，由外商创办，后被中国民营资本收购。上海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是民营股份公司，没有政府资助。其他像上海最大的电影公司、最大的演出团体等都是民营的^[7]。

上海人的创新也是由来已久。明代徐光启与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交往，吸收西洋文明，甚至加入

天主教，在当时是需要非凡勇气的。近代以来，上海一直在领导全国的创新潮流，近代上海在法制、城市规划、城市管理、科学技术、文化市场建设等方面，都紧跟世界潮流，在全国独树一帜。任伯年等人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画，刘海粟率先使用人体模特儿，周信芳等人的机关布景，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举动。建筑方面，石库门就是开山之作^[8]。这些事例都说明了上海人具有现代意识和进取精神，富有想象力和创新意识。

（二）规则意识及法治精神

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19世纪后半叶上海的出口贸易量超过了全国的一半以上。在长期的商贸往来和市场竞争中，上海人养成了精于算计的本领和务实的生活习惯。“就在这个城市，胜于任何其他地方，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西方和因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中国——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两者接触的结果和中国的反应，首先在上海开始出现，现代中国就在这里诞生。”^[9]

近代城市文化在价值观念上表现为科学与民主观盛行带来的平等观念，在具体文化形式上表现为电影、大众传媒、近代出版、学校教育等。

近代市民文化相较于传统文化表现出鲜明的实用性、大众化色彩，不再是少数人颐养性情或争取功名利禄的特权，而是作为一种文化商品进入大众消费领域，如商人捐官现象使中国近代城市社会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绅商，兼具商人及士绅的身份。绅商的出现，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改变了人们对金钱、身份、权力的传统看法，客观上促进了平等、法治等观念的形成。城市文化的平等意识及公众参与增加了市民相互交流的机会，使市民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与新文化，并使海派文化成为一种真正的大众文化。

近代上海租界设立了一系列市政管理机构，如工务处、警务处、公共卫生处、火政处等，并制订了一批法规。这些法规，对居民的居住、作息、建筑、行路、卫生等做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条分缕析，名目繁多。长期的法治传统，培育了上海人的法制意识，养成了上海人守法的习惯。民国初年，上海报人姚公鹤就指出：“上海人历经英人熏蒸陶育，服从法律习惯已较胜于内地。”租界内西方司法制度的引进，也使上海人早于内地人有了寻求法律保护的意识。1930年江苏全省6300件民事诉讼案中，上海

市占了七成以上。1935年,上海仅律师公会等律师组织的成员,就占了全国律师的40%^[10]。

建国后,“上海制造”闻名全国,“海派文化”成为全国“商业文化”的领军者,其突出表现,一是上海产品以其可靠的质量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喜爱,因为上海商家诚实守信,上海人重视法规、重视契约;二是上海人的劳动力素质、整体文化水平较高。据1989年的统计,上海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略高于我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接近韩国和我国台湾,高中入学率达77.6%,专业技术人员总数84.3万,居全国第二位^[11],高素质的人群更容易遵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范和准则。上海在百余年中养成的一整套行为规范和文化精神成为其引领全国、走向世界的独特的优势。

(三) 爱国精神

上海人的爱国精神由来已久:从晚清的两次四明公所事件、拒俄运动、大闹会审公堂事件、抵制美货运动,到民国时期的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淞沪抗战。还有跨越晚清民国的要求公园开放运动、华人参政运动,每有爱国运动,上海人必走在前列。一些上海人还带着原有的家乡情结,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上海是中心,领袖人物中颇多广东、福建人,因为遭受美国歧视的美洲华侨多为广东、福建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因事涉山东,上海的山东人走在运动前面,积极发起各项爱国活动^[10]。

上海人也积极参与建设家园活动。杨斯盛晚年以数十万资财,兴办学堂,先后创办广明小学(后人改为斯盛中学)、浦东中学、青墩小学,创建南市医院,重造严家桥,修筑洋泾、董家渡路、南码头等。黄炎培在辛亥革命前,先后创办和主持广明小学和师范讲习所,担任浦东中学首任校长,并参与发起江苏学务总会,1918年,创建中华职业学校,后又着手筹办高校。“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创办《救国通讯》,宣传爱国主义。

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大力支持全国工业化建设。改革开放初期,上海默默为全国创造财政收入,提供技术、人员支持。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带动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崛起,上海始终把国家的需要放在首位,始终服务大局不折不扣,辐射带动扎实有效。

(四) 敬业精神

上海人对待工作重视细节,具有工匠精神。上海人注重仪表,即便在炎炎夏日,“正宗”的上海男士依然衣冠楚楚,穿皮鞋和袜子。上海的报刊,很早就刊登介绍吃西餐的礼仪,刊登注意生活中不雅观的细节之类的文章。上海人的文明习惯是近百年的西方法治约束的结果,在日常生活中仍然能感受到这种文明的传习。

总之,“海纳百川”是海派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以往,上海敞开胸怀,创造出了昔日的“海派文化”。今天,上海更需坚持与时俱进,给个人的发展提供公平的机会和条件。城市文化建设应让亲情关系、熟人关系向业缘关系、法理关系转变,更多地通过平等的契约关系、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关爱弱者的人文情怀引导和鼓励市民对社会价值的追求。

三、海派文化的发展与传承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海派文化建设更要改革创新,以不断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的需要,同时海派文化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一) 创新发展,不忘本来

海派文化的发展要不忘本来,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其内涵。回望过去,上海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拥有反帝爱国史资源、抗战文化资源、红色文化资源、近现代工商业文化资源等具有当代价值的历史文化资源。海派文化发展更需要在传承中转化,在创新中发展。美国人类学家莫菲指出:“任何新的文化项目,无论是外来的,还是自生的,必须是对文化传统有意义时才能被接受,如果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与传统不一致的事物,无论

是思想、工艺品、信仰、还是时尚，都会很快被拒绝的。另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如果一个文化项目被接受的话，都是经过解释、改造的，使其与接受文化结构相适应。”^[12]海派文化要大力弘扬“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现形式，引导人们从正确认知历史中走向未来，从延续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

海派文化创新发展要处理好以下三种关系：一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历史学家克罗奇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文化、文明，归根到底都是对人的生存状况与精神世界的反映。中国恢弘壮阔的历史，历经沉淀和发酵，日益丰富和精彩，不需要对西方文化仰视与全盘肯定，对传统文化回归也必须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真正做到批判继承，实现文化自信。二是东方与西方的关系。由于历史原因，上海对自身历史的态度和情感远不及对西方文化亲近，人们对复制欧陆风格的建筑充满激情，而对城市文化保护，尤其是对老字号的再开发思考得相对较少。三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全球化的今天，如何既保持自身的完整独立，又积极参与世界文明的构建，在世界事务中拥有话语权，是海派文化未来建设中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取长补短，吸收外来

19世纪中叶开埠后，随着大批国外移民的涌入，上海逐渐成为远东地区的世界文化中心。这些众多的国外移民密切了上海与世界各地的联系，推动了世界各种文化在上海的传播、交流、融合，使上海在20世纪的30至40年代成为一个与纽约、伦敦、巴黎齐名的国际文化中心。美国的米高梅电影公司早在1930年就在上海设立中国公司，并对多家影戏院授予放映权，美国的福克斯公司也和上海诸多首轮影院订有放映权合同。好莱坞电影带入上海的不仅仅是故事情节和漂亮的男女明星，随着好莱坞进入上海的，还有他们十分精致的发行方式和营销手段。影院本身为外来西方文化，从设施及建筑外部，都引进了西方的新工艺：如音响、隔音、冷气、意译风、字幕等；作为软件的经营管理，也清一色遵循的是西方式的游戏规则^[13]。

上海因多样的外来移民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群体，如：以淮海中路为中轴的法国和俄罗斯文化；以南京路和外滩为代表的英美文化；以四川北路为

代表的日本文化；以舟山路附近当年犹太难民聚集地为中心的犹太文化和德奥文化；等等。这些历史上积累的广博丰厚的世界文化资源，是上海宝贵的无形资产。1994年，“犹太人在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促进了虹口区对历史上犹太文化资源的研究和开发。为纪念二战胜利60周年而举办的“犹太难民重返上海”系列活动，促进了上海的对外交流。上海市有关部门还积极帮助卢湾区整理研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相关史料，建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博物馆^[14]。

总之，上海必须以全球化的眼光和心态接受域外文化，超越西方中心论观念，以开放的视野和胸襟在取长补短、融会贯通中促进海派文化的发展。

（三）以人为本，面向未来

人是文化的中心。文化的对象和内容都与人类关涉在一起^[15]。刘易斯·芒福德在其经典名著《城市发展史》中说得好：“城市变成了一个特殊的环境，它不仅支持着王权制，而且创造着不同类型的人。这种新型的人，与其处于较狭窄环境中的同类相比较，更容易接受宇宙的现实，更容易超脱部落社会习俗的羁绊，更能以同化旧的价值观而创造新的价值观，更能做出新的决定，选择新的方向。……终于，城市本身变成了改造人类的主要场所，人格在这里得以充分的发挥。”^[16]海派文化以文化人，以人文的精神与关怀充实文化内蕴，在以人为本、面向未来中拓展海派文化发展的天地。

面向未来，上海致力于打造“上海文化”品牌。2018年4月，《“上海文化”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了“上海文化”品牌的四层级体系，通过打造一批国内、国际知名的文化品牌，彰显城市精神和品格，为城市发展塑形铸魂。这些都体现着城市的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对于构筑新时代的战略优势，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文化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知名文化品牌可以充分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让市民更好地享有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面向未来，上海还需要传播海派文化，推进海派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海派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向世人展示东方国际大都市的良好形象。

参考文献：

[1] 张鸿雁. 上海文化核心价值的缺失批判与“新海派文

- 化”的建构研究——上海城市发展与规划战略纠谬与创新[J]. 中国名城, 2011(2): 8-16.
- [2] 陈放明. 文化与资本的对话——首届上海文化论坛综述[J]. 探索与争鸣, 2014(2): 94-95.
- [3] 刘士林. 上海文化: 究竟应该怎么发展和改革[J]. 长白学刊, 2015(6): 119-121.
- [4] 杨剑龙. 拓展海派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几个因素[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14(1): 71-74.
- [5] 熊月之. 上海城市文化的多元传统[N]. 解放日报, 2013-03-08(14).
- [6] 汪熙, 魏斐德. 中国现代化问题: 一个多方位的历史探索[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4.
- [7] 杨扬. 强势政府主导下的文化出路——对上海城市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J]. 探索与争鸣, 2007(8): 10-13.
- [8] 熊月之. 上海城市精神述论[J]. 史林, 2003(5): 1-12.
- [9] [美]罗兹·墨菲. 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 [10] 熊月之. 包容、争优、法治与爱国——开埠通商与上海人特性的形成[J]. 浦江纵横, 2013(12): 14-17.
- [11] 杨东平. 城市季风: 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
- [12] [美]罗伯特·F·莫菲. 文化和社会人类学[M]. 吴玫, 译.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8.
- [13] 李伦新, 熊月之, 严家栋, 等. “海派文化”学术笔谈[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5): 44-56.
- [14] 潘光. 海派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上海的国际竞争力[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14(1): 67-70.
- [15] 安道玉. 文化之源与中原文化增强的路径和策略研究[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7(1): 81-84.
- [16] [美]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 起源、演变和前景[M]. 倪文彦, 宋俊岭,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9.

(编辑: 朱渭波)

(上接第61页)

四、结束语

在《白雪公主后传》中, 作者巴塞尔姆将头发的意象贯穿小说始终, 借此串联了大部分小说情节, 对美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他极力渲染秀发之美, 以反衬现实社会中白雪公主空虚放荡的形象, 扭曲了女性之美; 又通过小矮人们对头发的反应, 展现了现代人精神上的贫瘠, 对心灵之美提出了质疑; 最后再通过一种另类的对头发的反应, 上升到了对人生的探讨, 将现代社会中人们生活的无目的性暴露出来, 解构生活之美。他将现代生活的片段以夸张的方式特写, 以头发为线索贯穿其中, 为读者描绘了现代人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面貌, 以无说教的形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从整体上看, 巴塞尔姆对经典童话的美好寓意都进行了颠覆, 保留原有人物与部分关系, 却构建出另一套适用于现代社会的体系, 以此也表明了后现代主义反传统的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 [1] [美]唐纳德·巴塞尔姆. 白雪公主后传[M]. 虞建华,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 [2]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1492-1493.
- [3] 姚思廉. 陈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131.
- [4] [美]纳撒尼尔·霍桑. 红字[M]. 姚乃强, 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5.
- [5] Wideman J E. God's Gym: Stories [M].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5.
- [6] [德]雅各布·格林, 威廉·格林. 白雪公主[M]//格林童话全集.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 [7] [美]小亨利·路易斯·盖茨. 意指的猴子: 一个非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M]. 王元陆,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8] [奥]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李步楼,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9] [德]黑格尔. 美学[M]. 朱光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10] 王拥军. 头发的美学和意识形态特性[J]. 艺苑, 2010(6): 60-65.
- [11] [美]詹明信.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M]. 张旭东, 编. 陈清侨, 等,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 [12] 虞建华. 后现代环境与巴塞尔姆的小说《白雪公主后传》(代序)[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 [13] 李玉平. 巴塞尔姆小说《白雪公主》互文性解读[J]. 外国文学研究, 2004(6): 67-71.
- [14] 苏轼. 苏轼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5] 曹山柯. 从《白雪公主后传》看后现代文学作品中的道德嬗变[J]. 外国文学研究, 2006(1): 67-76.
- [16] [俄]普希金. 普希金全集-2-抒情诗[M]. 肖马, 吴笛主编. 乌兰汗, 等, 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7.
- [17] 陈世丹. 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详解(中文版)[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0.

(编辑: 巩红晓)